

在我们家，除了书多报多刊物多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随处可见，那就是——笔。式样繁多，类型不同，色彩丰富——钢笔毛笔铅笔蘸水笔圆珠笔，红水笔蓝水笔黑水笔绿水笔，散放在书桌上，茶几上，夹在书刊中，插在笔筒里，可随时取用。

父亲辛笛喜欢给我们买笔，从学字用的铅笔到圆珠笔到钢笔，几乎都是父亲给我们买的。记得最清楚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解放后很少发表诗作，有一次用他难得拿到的稿费给我们一人买了一支自来水笔，是当时最流行的新式样，包头铱金笔，吸墨水的部位与老式钢笔截然不同。我们拿到这么好看新奇的笔，雀跃起来。小姐姐圣珊和我忙着找墨水瓶打墨水，试试我们的新钢笔，而哥哥圣群坐在客厅的大餐桌旁一眨眼的工夫就把给他的笔拆得七零八落，动作之快让我们咋舌，惹得父亲大光其火：“跟你说过八百遍了，要爱惜东西，要爱惜东西，就是不入神，当作耳边风！”训斥儿子的语言也用文学夸张——“八百遍”，就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一样。

父亲对笔的爱好以使用为目的。他写作写信时爱用笔尖细些的钢笔，适合他蝇头小楷的字体，看书报他认为重要的词语或段落上则爱用粗红铅笔勾画出来，读古典诗词在他欣赏的诗句下最喜欢用绿水笔画上小圈——绿色是他最爱的最爱。他原先也喜用名牌笔，一支派克笔从解放前一直用到解放后，陪伴他写出不少诗文。但“文革”中把他大量的藏书连同心爱的派克笔一起抄走，他体验到李清照在金石图籍散失后的心境，悲愤无奈之余还能达观排解。在苦闷的岁月里他悄悄写旧体诗，与远在北京的钱钟书先生私下里唱和不断。那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抄写他们的唱和之作。家

最近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广告，画面是一位民间艺术家把手中的剪纸《小红人》从天空中飘散开来的镜头，红红火火的煞是美丽。小红人是根据中国民间的抓髻娃娃而赋予新的剪纸语言，被世界各地的艺术界所认可。

抓髻娃娃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说法，但都是作为受惊驱鬼、辟邪招魂用的，也有叫“招魂娃娃”、“送鬼娃娃”、“送病娃娃”、“辟邪娃娃”、“五道娃娃”或“纸人”的。它的基本特征是正面站立，圆头，两肩平张，两臂下垂或上举，两腿分开，手足皆外撇。抓髻娃娃有性别之分，一般多为女性，也有的不象征性别的。女性抓髻娃娃头梳双髻或双辫，头立双鸟（双鸡）或戴花冠、花蔓或戴胜。双手外撇或上举，或双手抓鸟（双鸡），或一手抓鸟（鸡）一手抓兔，或一手抓鸟（鸡）一手抓鱼，或双手抓鱼，或双手举莲；还有双襟双鸟（鸡）、

我们家的笔

王圣思



面的笔迹已似淡墨山水，但透过流畅的笔画还是可以看出他抄写时兴致盎然。

晚年的父亲仍爱好各类型笔。只是轮到儿女及孙辈给他买笔，或朋友从海外给他带来新笔。八九十年代流行不用吸墨水的水笔，父亲同样用得高兴，只是用完后还舍不得丢掉，结果家里到处都有急用时却写不出字的笔。

父亲在给人题字时往往坚持用毛笔，而母亲则是他书法的最好鉴赏人。母亲认为他的文人字自有特点，写核桃大的字最合适，所以他多用不全部化开的大楷笔。在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上午客厅的光线比较好，母亲坐在大餐桌的一端，为父亲磨墨，看着他握笔一行行写来，那是家里很温馨的时刻。父亲写好后总拿起宣纸给母亲过目，请她作出评价，父亲很看重她的意见。直到母亲患骨质疏松症，已无法行走，精神不济时，只要把父亲写的字拿给她看，她还是能一眼就分辨出写得认真还是潦草；对写得好的，她会点头表示赞许；对写得差的，她会轻轻地她说几个字：“又不舒服了！”确实，那正是父亲深感身体不适但为完成“题字任务”而仓促写就的。在母亲病重及去世后父亲连握毛笔的力气似乎都随母亲而去，他只用南京小友送他的毛笔式水笔题写，而且自认为写得再也不如毛笔字好了。

家里至今还留有一支绿杆金笔——浪琴牌，是父亲送给母亲的礼物。母亲一直用它备课、写信、翻译，后来笔杆已裂缝，母亲就用胶布裹起来继续使用。现在两位老人已驾鹤西去，但爱情的象征——笔却还在，记忆着父亲诗作《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相恋、成家、立业的故事。

里还留存有他用毛笔抄在老式水印信笺上的诗作，另有两本用钢笔抄写的练习簿，上

衡山路811号小红楼，原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门廊的玻璃华盖，用紫铜的骨子撑在那里，成为一把新月形的大伞。一株玉兰，粉白色的花瓣，颤巍巍地托在枝头上，空茫中，偶尔的，也有短短的一截子花香。

上世纪初，留声机是一个时髦的物件。大约从1921年起，百代唱片公司邀请名伶和明星进棚录音，制成蜡模，送往国外印制唱片，再辗转返回中国销售，刺激了留声机和唱片制造业的发展。

留声机与小红楼

淳子

楼。正待进门，恰逢作曲家黎锦光从里面出来。七十多岁了，高挑，白净，一副金丝边眼镜，衣服总是灰暗的，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有人与他说话，他必是局促不安，声音细薄得像青衣的小嗓子。歌星白虹与他离婚，去了北京。黎锦光留下来，据说与保姆日久生情，结婚生子。

人的一生，原来也可以几句话就带过的。

黎锦光先生每天来，玉兰树下经过，身子单薄，如同一片叶子。

知道他是《夜来香》的作者，更是崇拜得很。他却敷衍道：“过去的事情了，没什么好说的。”

小红楼客厅的一壁，开一扇小门，通向厨房。黎锦光等一批老人在那里上班。名义是整理资料，其实只是混口饭吃。地上马赛克，冬天冷得不行，那些老人倒也不怕，穿了很厚的棉衣，双手插在袖

都说小红楼里隐匿了无数妩媚的魂灵头。

1985年初春，我去小红楼



楼。正待进门，恰逢作曲家黎锦光从里面出来。七十多岁了，高挑，白净，一副金丝边眼镜，衣服总是灰暗的，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有人与他说话，他必是局促不安，声音细薄得像青衣的小嗓子。歌星白虹与他离婚，去了北京。黎锦光留下来，据说与保姆日久生情，结婚生子。

黎锦光先生每天来，玉兰树下经过，身子单薄，如同一片叶子。还有一位胖老头，邋遢的样子，一根链子，吊着一大串的钥匙。一日三餐，只要有肉，便朗声大笑。笑声里有帕瓦罗蒂的高音。与他熟了，话亦多了起来。他年轻的时候，留学德国学习电器。回国后，在唱片公司掌控录音器材。他腰间的那些钥匙，锁着的，便是百代唱片公司留在上海的唱片母带。

80年代，在东南亚红了又红的明星李丽华来唱片公司访问，迟暮之年，依然美丽得让人心动。李丽华的丈夫严俊与严华是叔侄，论辈分，李丽华自然是严华的“叔叔”。严华是周璇的第一任丈夫。签离婚协议时，严华在浦东大厦一个写字间里签字，周璇在自己住所签名。冷淡至此。

公私合营后，严华在上海唱片公司车间里做工。几十年了，斯文还是不改的。

李丽华的声音薄、甜，有戏曲的味道，她唱“树上小鸟啼”，嘴不自觉的撮成一个圆，柳眉轻盈的翻飞去了鬓角。

严华陪在一边，老是老了，风度还是有的。有板有眼地配唱，一样的眉目传情。毕竟是多日不唱的缘故，忽然一口痰上来。严华道：“不好了，成了‘痰派’”

我已记不清自己孩提时是如何开始画画的，却见证了我5岁小孙子画画涂鸦的人之初。孩子用笔到处胡乱涂抹一通的初始，肯定远在学习写字之先。相比之下，识字、写字是一种理性化的认识手段，把自然的物象或含义，符号化地进入儿童的思维活动，加以存储，终究要繁复、枯燥，而画图是一种直观的感性表达。孩子们用图画表达对外部世界纯真的感受，物体、物象，甚至于什么也不是的一团乱线，那也是情绪和感情的宣泄，从手指的舞动中享受涂鸦的快感。再大一些的孩子，会边画边自语地编撰他自己心中的故事，即使矛盾百出，却也自得其乐，这无疑是玩具之外的另一种游戏方式。正是制约于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之间的差异，以成人无法比拟的童趣和纯真，产生一种稚拙美感，打动着人们的心灵。而它的表现形式是线条，这些无遮拦无次序无造作的线条，不正是隐喻着速写的源起？

到数千年前，论及人类之初绘画艺术的起源，无论是外国原始洞穴的野牛壁画，还是分布中国各地我们祖先留下的岩画，也大多以线条构建了远古人类祖先的劳动生活和生命迹象。线条的艺术常被诠释为速写表现形式的本质，是否可以此设想，按概念划分人类的绘画艺术初始，不正是源于现在所称谓的速写？

（本文为《张培础速写》序）

约会的宋家。张爱玲姗姗来迟。小坐片刻，推脱有事，轻盈告退，连事先预备的茶点也没有问津。

那一年，百代唱片公司也到了香港，重新找回陈蝶衣、姚敏等一班人写歌。可惜香港市民只懂得粤语，曾经在上海、东南亚一带流行的“时代曲”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挣扎。



梅开春不老 吴颐人作

小红人与抓髻娃娃

郑树林



很清楚的，至于不象征性别的抓髻娃娃就比较随便了。“抓髻娃娃”神通广大，无所不能，不仅能延续生命，繁衍后代，而且威力无边，洪水涝灾，淫雨连绵时节，剪个手拿扫帚的纸人用红线系上挂在院子里，或系在木棍、高粱秆上插在墙上或院子里，有的也贴在窑洞里，叫“扫天婆”、“扫天媳妇”、“扫天娘娘”。它们有的梳髻，叉开双腿、双手

的愿望结合起来，发展为“吉（鸡）庆（磬，即笙）有余（鱼）”（胖男娃娃和鱼鸡的结合），“连（莲）年有余（鱼）”、“连（莲）生（笙）贵子”（胖男娃娃和莲鱼的组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小农经济的长期延续，使得原始形态的“抓髻娃娃”、“拉手娃娃”的图腾形象和巫术艺术遗存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为研究中国文化和艺术与民俗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张贤是上海同仁医院医生，是第一个来“沙家浜”部队的上海医生，是创建“民抗”后方医院的院长。1937年上海沦陷，张贤正在上海同仁医院学医，他立即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先在难民收容所工作。1938年春，地下党员李建模分配他到上海浦东的大团镇，建立临时医院，以医生的合法身份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我在那时也由李建模介绍到这个医院当护士。

1939年1月，李建模对他

说：“常熟有一支由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名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总部（后来简称‘民抗’），非常需要医务人员。”要求张贤立即到那里去创办一个医院，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决定和他一同前往。

“沙家浜”部队的上海医生

庞露

的安全，必须经常在水上流动，每流动一次，都要用门板把重伤员抬上船，到了目的地再把他们抬到老百姓家中。伤病员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集中时我们在老百姓家中放一张桌子，摆开医院器械看病。敌人“扫荡”时，我们便背起割草的箩筐，箩筐里藏着

药品，边割草边观察敌情，机智灵活地找到隐蔽在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进行换药治疗。

1939年夏天，我们自备了一只小船，医疗设备和药品就放在这只小船上，自此我们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水上流动医院。莲荡浜有个贫农孙根乔腹腔生瘤，长期发烧，昼夜啼哭，病情危笃，张贤得知后，顾不上吃饭，赶去诊治，用简陋的设备，为他进行了手术，排除了腹腔的脓液，病人体温随即下降，但由于营养跟不上，出现了休克，张贤拿出仅有的几个钱买糖，给他补充营养，不分日夜，不避风雨，不嫌伤口脏臭，常来给他换药和护理，孙根乔终于脱险治愈。这一救死扶伤的故事，很快在群

众中流传，周围不少有病而无力医治的农民，划着小船寻找流动的后方医院求医，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都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病人热情相待，细心治疗，军民更加鱼水情深，融洽无间。由于日夜辛劳，到了1943年，张贤在句容江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时，竟患了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他还顽强地坚持着工作。全国解放后，孙根乔千方百计寻找线索，领着老母亲来到我家看望当年的救命恩人，当他们得悉张贤已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母子抱着张贤的两个儿子痛哭了一场。

明日
十日谈
请看《将军与新兵》
新四军中上海兵

我无意要抬高速写的地位，但在不少画家的心目中，速写确实有着相当的分量。至少在我的心中充满了对速写的感恩。我是一个中国画人物画家，早年在中学美术老师张文祺先生的启蒙下，14岁开始画速写，引领我跨入艺术殿堂，速写贯穿并维系着我的艺术生涯，成为我艺术上的终身伴侣。在我熟识的同道画家中，特别是人物画家，都颇有关感。

我这不仅仅是因为速写提高了我们的造型能力，也不仅仅因为速写是技巧层面的表现方法问题，而更感悟到速写是一种修炼，是一种培养锻炼艺术家以特有的视角对社会、生活、事物的观察能力、反应能力、理解能力、表现能力、动手能力、持久能力、处理能力诸综合素质的最佳手段。在画家艰辛的学艺过程中养成多画速写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到达艺术

彼岸的必由之路。正是基于这种共识，速写已成为全国高等艺术院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画家，那么就先从速写开始吧。在数十年风云岁月后，当有一天你回首往事时，也许心中会涌出一句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感恩速写。

（本文为《张培础速写》序）

约会的宋家。张爱玲姗姗来迟。小坐片刻，推脱有事，轻盈告退，连事先预备的茶点也没有问津。

那一年，百代唱片公司也到了香港，重新找回陈蝶衣、姚敏等一班人写歌。可惜香港市民只懂得粤语，曾经在上海、东南亚一带流行的“时代曲”只能在逼仄的空间里挣扎。



梅开春不老 吴颐人作